

湖北人物 传记

(试写本第一辑)

湖北省志·人物志编辑室编

1982.10

编 印 说 明

一、为了做好省人物志的编纂工作，我们以试写本形式分辑编印传记部分，以便广泛征求意见，逐步积累成果，争取三五年内完成传记试写任务。我们期望，试写本第一辑的编印，将促进社会各方面对人物志作用和意义的认识，主动积极地担负起各自地区、战线、部门人物传记的写作任务。

二、人物收录时限、范围，暂定在一八四〇年以来，籍隶湖北或在湖北长期工作且有重要影响的外省及外国籍各类人物。本辑在编排上暂按清末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以来军政人物和经济文化等其他人物这样三个方面，并就人物在历史上的地位作用，参照登上历史舞台的先后进行排列，不具有正式体例的意义。

三、在方志人物传记写作方面，我们试图以两三千字的篇幅来概括一个人物一生的主要方面，并体现人物的特色。实践是初步的，本辑所载仅是探讨传记写作的一次尝试，尚不具有“样品”的意义。

四、为了录以备用，我们在选用稿件时，标准稍微放宽了一点，因而，所收传记不都是在正式编纂时一定要采用的。

五、真实，是使历史记载传之久远、跻于史册之林的基础。由于所录人物来自各个时期、各个社会领域，由于近现代社会变革发展的剧烈迅猛，在史料的完备和可靠性上存在着不足，请有关方面、学术团体、知情人士对本辑传记提出订正和补充意见。

六、撰写一篇概括人物一生及其主要言行的传记，是一件相当费时费力的工作。本辑所收传记，有不少是在领导的大力支持下，作者走遍大江南北，采访百十人次，历时数月、数年，甚至

十几年才得以成稿，每字每句都凝结着作者、知情者、提供史料机构以及有关单位的共同劳动，在本辑编印之际，特一并致以谢忱。

七、限于能力和经验，本辑传记在体例、内容、文字以及编排上，错误在所不免，热情盼望有关方面、革命前辈、专家学者及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湖北省志·人物志编辑室

1982. 10.

目 录

刘静庵	(1)
王 汉	(4)
孙 武	(5)
刘 公	(8)
彭、刘、杨(合传)	(11)
季雨霖	(15)
阙 龙	(18)
李长龄	(20)
宋开先	(24)
张国荃	(26)
杨志超	(29)
鄢树藩	(31)
白逾桓	(32)
刘文岛	(35)
沈肇年	(39)
葛皇甫	(43)
董必武	(45)
李汉俊	(52)
恽代英	(56)
陈潭秋	(60)
许白昊	(65)
李之龙	(68)

陈荫林	(72)
陈定一	(75)
张 华	(77)
徐全直	(79)
赵世当	(82)
周逸群	(86)
段德昌	(89)
邓赤中	(92)
王晓芾	(95)
胡幼松	(97)
娄敏修	(100)
许 栩	(102)
曹志坚	(104)
代补天	(106)
吴焕先	(108)
曾中生	(111)
邝继勋	(114)
蔡申熙	(116)
潘忠汝	(119)
吴光浩	(122)
戴克敏	(126)
曹学楷	(128)
吴致民	(130)
姜镜堂	(132)
张 浩	(134)
陈少敏	(138)
杨经曲	(142)
张文津	(146)

李炳南	(149)
陈柱天	(152)
董毓华	(155)
夏娘娘	(158)
黄菊妈	(160)
李全洲	(161)
黎贤良	(163)
曹廷杰	(164)
干 铎	(166)
余家菊	(169)
谭鑫培	(171)
章水泉	(173)
刘元祥	(177)

刘 静 庵

刘静庵（1875—1911），原名贞一，字静庵，又作敬庵、敬安，从军时名大雄。潜江人。少怀大志，好读书。一九〇三年到武昌，时范腾霄在督署护军马队第一营管带黎元洪处任书记，一见称奇，推荐于黎。刘入伍后操练认真，谨守营规，暇时与同营士兵谈种族大义；与外界人士多有联络。

一九〇四年夏，黄兴自长沙写信与刘谈革命事，信误落文案手中，刘因称病离营；同吕大森等在武昌组织“科学补习所”，进行革命活动。时清廷户部右侍郎铁良南下，至湖北。刘与王汉、胡瑛等密谋行刺。王、胡自愿担负此事。一九〇五年二月，王汉在彰德刺铁良未中，投井死。刘极为悲愤，革命之志更坚。

不久，“科学补习所”以长沙“华兴会”事受牵连被封闭。刘利用在美国圣公会所设日知会阅览室任司理之便积极从事革命活动。为取得教会的信任，刘接受宗教洗礼，并取教名“保罗”，兼任教会所办文华书院神学系的汉文教习。

为了宣传革命，刘从日本、上海订购进步书报如《猛回头》、《黄帝魂》、《湖北学生界》等，供人阅览。又定期讲演时事。于是从者日众，或申请为会员，或捐款作经费，原“科学补习所”同志，亦得以重新集合。一九〇六年二月，革命的“日知会”，在旧日知会中诞生，正式开成立大会。到会会员百余人，推刘静庵为总干事，辜天保、李亚东等为干事，冯特民、陆费逵等为评议员。时“同盟会”总部派余诚为湖北分会会长，于一九〇二年春回鄂。余以“日知会”为“同盟会”活动场所，不少“日知会”会员加入了“同盟会”，“同盟会”的机关报《民报》，也由“日知会”转发。“日知会”实际上成了“同盟会”在国内

的分支机构。刘还筹办了江汉公学和东游预备科，以培养留日人才。

一九〇六年六月，孙中山派同盟会会员乔义生陪同法国人欧吉罗来汉考察党务，刘率领“日知会”干部到江边迎接，在欢迎会上发表演说，对革命起了极大的鼓舞作用。

同年十月，孙中山派朱子龙、梁钟汉、胡瑛等回汉筹划响应萍浏醴起义事，亦以“日知会”为基础。刘静庵在汉阳琴台召开会议，讨论行动计划，不料为叛徒郭尧阶告密，被捕下狱。同案被捕者尚有朱子龙、梁钟汉、胡瑛、季雨霖、张难先、吴贡三、殷子衡等人。

时清政府正在悬赏缉拿湖北全省会党首领刘家运，刘被误指为刘家运，严刑拷打，杖至一千四百，肉绽见骨，几次晕死过去，仍坚强不屈。清巡警道冯启钧为了邀功，竟伪造供词，乘刘刑后昏迷之际，捺上刘的手印，判处死刑上报，定于一九〇七年一月二十九日执行。

刘静庵等人一案，为自立军事件以后的一次大狱，引起社会广泛的注意和同情。除革命同志极力营救外，教会中美籍人士如吴德施主教，孟良佐会长，穆德博士等也出面交涉。同时吴禄贞、程家桢等也向清肃王建议“毋杀党人，免增满汉恶感”。清廷不得已乃于一九〇七年一月二十八日电鄂“从缓办理”，但案仍悬而不决。直至一九〇九年，才重新宣判。除朱子龙已死狱中，季雨霖、张难先因病保释外，判处刘静庵、胡瑛永远监禁；吴贡三解回黄州监禁十五年；殷子衡监禁十五年；李亚东监禁五年；梁钟汉解回汉阳监禁三年。

刘静庵在狱中，威武不屈，用“铁血军”名义从事活动，团结了很多难友和一些狱卒。他虽历尽酷刑，仍读书不辍，所写笔记，一字不苟，遒劲有力。他还写了不少哀痛生民，激厉志气的诗，如《移新监》一首：“向前已是惨悽极，那信惨悽更有深。

六月霜雪河海冻，半天云雾日星昏。中原有土兆民痛，上帝无言百鬼狞。最是达材须磨炼，红炉烈火炼精金。”

据狱卒潘季贞说，刘静庵坐如钢铸，动如满载船。虽患重病，白天也很少躺下；情势再紧迫，态度仍从容自若；脸上从无暴厉的表情，口中从无粗野的语言。以众人的疾苦为疾苦，众人的欢乐为欢乐。

一九一一年六月十二日，刘静庵以饱受折磨，死于狱中。年三十六岁。其母闻讯赶来，见其遗体枯瘦如柴，须发尽白，竟不敢相信是自己的儿子。刘死后三月，武昌起义爆发，终于推翻了满清封建王朝。

刘的遗体，由教会收敛草草埋葬。一九二八年，湖北省务会议议决公葬于武昌伏虎山，张难先作墓志铭。一九三八年，又立碑于“日知会”旧址以纪其事。

其遗著、遗物、读书笔记以及受刑的白衬衣等，由同时系狱的党人殷子衡妥为收藏，至今犹存。

(省政协文史办公室供稿)

王 汉

王汉（1884—1905），名竹庵，又名潮，字怒涛。湖北蕲水（今浠水）人。父兄教书为业，因而早通经史，能诗文。性豪侠，向往历史上的英雄人物。1904年到武昌省城读书，常与青年朋友刘静庵、何见田、熊子贞、朱子龙等谈论革命，常言：吾国士大夫酣嬉游乐，将以糜弱亡国；革命不可空谈，必决心拼一死。

科学补习所成立，王首先加入；与胡瑛相友善。一九〇四年秋，黄兴在长沙起事失败，武昌科学补习所牵连被封，王与胡瑛匿居汉阳。冬，清户部侍郎铁良南下搜括东南财赋。刘静庵等谋刺铁良，王愿以身任，胡瑛同行。出发前，对新婚月余的妻子说：“我有老母，将以累卿。”妻未解深意。王本想在武汉动手，恐连累家庭亲友，即随铁良北返，思于途中相机行事。车至彰德站，见铁良下车乘轿，警卫稍弛，王使胡瑛在路旁等待；他一人追到轿前，向轿中连击三枪，不中。铁良的卫士尾追急，王知难以逃脱，开枪自杀，伤重，投道旁井中自溺死。时为一九〇五年正月某日，年二十二岁。清吏遍搜其身，仅得绝命书一篇。自述愿以身殉民族、民权的决心。遗体由胡瑛转托本地商人葬于彰德城外。

王汉虽然一击不中，但他“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壮烈行为使当时先进青年为之振奋。后来吴樾炸清出洋五大臣，即受王的影响。

王具特识，言必有中。曾与胡瑛互评性情，胡说王为迂士，但缓急可恃；王说胡太灵活，应敦励志操。后胡瑛于袁世凯行帝制时为“筹安会六君子”之一，证明王言有所谓然。现辛亥武昌起义纪念馆有王汉画像。

（省政协文史办公室供稿）

孙 武

孙武（1880—1939），原名葆仁，字尧钦，或作尧卿，又字遥仙，号梦飞，名片曾作“孙武摇清”，表示反清之意。汉口柏泉乡人。自幼好武，因以“武”为名。十八岁入湖北武备学堂，与吴禄贞、傅慈祥等同学。毕业后，任湖南新军教练，调武威营队官。一九〇〇年，经吴禄贞介绍任“自立军”岳州司令，事败，匿居乡间。又先后参加“科学补习所”、“日知会”等组织，积极从事反清活动。

一九〇六年，萍醴起义失败，湖北大兴党狱。他兼程北上，由东北经海参威去日本。时黄兴正起兵云南河口，他决意前往参加，至香港而滇事已败，乃折返日本，入大森军事学校，与喻培伦、黄复生、焦达峰等学制炸弹。“共进会”在东京成立，被推为军事部长。

一九〇九年春，他随身携带都督关防、同盟会及共进会的规章、誓词回鄂。经过一段活动，认为：“运动官吏，而官吏利欲熏心；联络会党，会党又野性难驯；惟有运动士兵，借矛夺盾”。于是在士兵中发展会员。是年冬，赴广州，由冯自由介绍加入同盟会。翌年春，回武汉，促使一度停顿的共进会又恢复了活动。

辛亥二月，党人谭人凤、居正、杨时杰等先后来汉，商讨起义事。谭等以武汉四面受敌，发难以广州为宜。孙武则力陈：武汉为东南枢纽，自张之洞建工厂、造军械以来，物力基础较丰，且毗邻湘赣，传檄可定，此地之可利用者一；瑞澂狂悖，侮慢缙绅，主张铁路国有，与载沣表里为奸，人无贤愚皆怨，此时之可利用者二；鄂省军队编练，优于他省，鄂军倡议，先声夺人，各省响应必速，且以军队为主干，秩序不致紊乱，租界可保无虞，

此人之可利用者三”。谭等称是。

于是孙武一面增设革命秘密机关，一面与文学社进行联合。九月二十四日，共进会、文学社举行联合大会，决定起义计划，孙担任主席。推举“文学社”蒋翊武为起义总指挥，孙为参谋长，设革命总机关于汉口俄租界宝善里十四号。十月八日，孙在总机关检试炸弹，不慎爆炸受伤，抬入医院；在场党人被捕，所有印信、旗帜、名册、布告和预制的“中华银行”钞票等亦被搜去，由俄巡捕解送清方。一时人心惶惶，在汉同志去医院向他问行止，他说：“为今之计，只有死里求生，即日起事”。当即令邓玉麟急至武昌小朝街军事指挥部下达起义命令。不料八日误期，九日晨彭、刘、杨三烈士就义。他闻之大哭，嘱即通知各同志于当日夜间大举。武昌起义，终于爆发。

起义胜利后，武昌军政府成立，孙武任军务部长。民军与清军战于汉口刘家庙一带，失利。黄兴来汉督师，孙对黄兴不满。后汉阳失守，武昌危急，黄兴东下，孙情绪更加消沉。刘公出面支撑，他又不与协作；黎元洪出奔，张振武阻之，他竟劝黎暂避，种种行为，颇为时人所不解。

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北京成立，孙以武昌民军代表名义参加意欲得一陆军部次长职务，黄兴不予，孙怨黄益甚，并进而怨同盟会。乃约集一些湖北人另组“民社”，推举黎元洪为理事长，孙任武汉分社副社长。社务由孙掌握，黎不过徒拥虚名而已。

孙武在武昌骄横跋扈，鄙视一切，引起各方不满，黎元洪又掉阖于其间。一九一二年二月二十七日发生驱孙事件，孙被迫辞去武昌军政府军务部长职。但究属早期党人，首义元勋，黎仍委为高等顾问。食上等级俸。武汉绅商复推举他出面负责筹备恢复湖北布、纱、麻、丝四厂生产。继调北京充总统府高等顾问，授陆军中将加上将衔。十月，授予勋二位，将军府成立，又授予将军府的义威将军。一九一五年十二月，袁世凯政府设置参议院。

被派为参政，他见袁时说：“蒙授参政，恭谢鸿施”。

袁死，孙依违于北洋军阀间，终无实职。曾去德游历。一九二二年，湖北督军肖耀南派他为汉口地亩清查督办，不久，肖死，孙亦去职。一九二六年，复任湖北地亩清查督办。北伐军抵武汉，孙去北京，学佛闲居。一九三九年十一月卒于北京拈花寺。

(省政协文史办公室供稿)

刘 公

刘公（1881—1920），原名湘，字耀宾，又名炳标，后改名为公，字仲文，别号非非子。襄阳人。其家为清末襄阳三大富室之一，有田地一万三千余亩，号称“刘百万”。叔伯四房，刘公就出生在这个巨富之家的三房。及长，性格豪爽。目睹清廷内政日非，外患日烈，慨然有振兴华夏之志。

一九〇二年，东渡日本求学，肄业于东亚同文书院，藉以联络同志，鼓吹民族革命。对陈天华的《警世钟》、《猛回头》等革命刊物，他极力资助，各翻印数万册，输入国内，以期振聋发聩。后入日本东斌学堂习军事，结识了一些有志之士。一九〇五年遇孙中山、黄兴于东京。孙组织同盟会，他首先加入。《民报》出版，他又捐助巨金。

一九〇六年，萍醴起义，刘奉孙中山之命回国，积极准备响应。后因泄密，潜回家乡。居三月，复至汉口图举大事，未成。再赴日本，入明治大学，学习政治经济学。

一九〇七年，他和张伯祥、焦达峰、邓文举在日本成立共进会，积极进行革命活动，后被举为第三任会长。一九一〇年（宣统二年）秋毕业，携带十八星旗、革命文告和重要书籍回国。由于奔走革命，积劳成疾，暂返故里疗养。养病期间，在鄂北、豫南一带继续进行革命活动，发展会员，鼓励青年从军。凡革命事业需钱时，他总是慷慨解囊。

一九一一年，武汉革命形势迅速发展。为了筹措革命经费，他对家里说：“顷蒙驻日武官说项，捐得一实缺道台，分发河南，可以走马上任，急需白银八千两”。此事得到其叔刘子麟的支持，即倡议款项由各房分摊；后刘公携带五千两银票赴汉。共进会获此巨款，更加积极开展活动。

九月二十四日，共进会和文学社召开大会，制定起义方案，初步决定刘为总理，蒋翊武为军事总指挥，孙武为军务部长；照共进会规定，总理即是起义后的大都督。由于他是共进会会长，所以更是当然的领袖。后因革命形势变化，没有按预定计划实现。

十月八日下午，他与孙武往汉口俄租界宝善里十四号机关部点验党员名册，孙武试验炸弹，不幸燃爆，孙受伤。刘公命李春萱将孙武送往同仁医院医治。本人隐蔽于汉口汉兴里友人处，得免被捕。武汉总、分机关被破坏，其妻李淑卿、其弟刘同等人被俄捕房捕去，彭楚藩、刘复基、杨洪胜三人被捕遇害。革命党人人自危。经过党人的紧张活动，决定仍照原定计划起事。

十月十日，清军第八镇工程第八营首先发难，武昌起义成功。次日晨，刘公与张振武、蔡济民等领导人在谘议局集会，组织军政府，推举都督。刘公再三谦让，孙武受伤未愈，蒋翊武在逃未归，都督一职，乃强使原清军统领黎元洪充任。同时又议立中华民国鄂军政府于阅马场谘议局。刘公任军政府总监察处总监察，监察都督以次官员。会议期间，刘公遣夏维松等代表军政府，渡江分访并通知驻汉各国领事，仍照十月十日以前清室与各国之原订各约，继续维持帮交。

未几，汉阳失守，武昌危急，黎元洪擅自出走葛店。公以总监察名义，布告城内外，并组织奋勇军以保卫武昌；人心粗定。又通令各机关，有关行政措施、人事安排、经费开支等须得总监察处批准。但孙武等不但不支持，反而故意刁难，有的人甚至把总监察处的命令退了回去。革命党人之间不团结。黎元洪乘隙置刘公于无足轻重的地位。刘公以总监察的名义，弹劾黎元洪弃城不守，结果也不了了之。

刘公深感总监察处无继续存在的必要，当武昌编组北伐军时，即表示愿意领军北伐。黎元洪、孙武自然赞同，委刘公为北伐左翼军总司令。但对左翼军的人事、装备，则又蓄意掣肘，多方阻

挠。幸刘公的革命资历较深，待人宽厚，鄂北、豫南的同志多愿随行。总司令部直属单位加上先锋队、奋勇军总共不过两千人。由于革命声威远震和河南人民光复心切，先锋队和河南奋勇军很快就分别进至河南唐河和新野等地；刘公亦于一九一二年三月二十日率本部抵达襄阳，以武力收编了光复襄阳的张国荃部，扩充实力，积极准备向北推进。就在此时，黎元洪竟指责他妨害议和，严令退出已被光复的地方，他拒绝接受命令。黎元洪想用武力解决，又考虑到他是革命元勋，乃电请大总统袁世凯调京任用，他坚辞不就。为了打开僵局，党人胡祖舜、蒋秉忠二人赴襄劝说，他才勉强应允。同年九月离襄赴京，就任总统府高等顾问。所部由黎元洪的嫡系王安澜部收编。

一九一三年三月，宋教仁被刺后，湖口起兵讨袁，刘公借故离京走沪。袁世凯称帝，他通电反对，并在汉口积极组织武装力量。袁世凯死，黎元洪任总统，他回京仍任原职。

一九一七年，皖系军阀段祺瑞独揽中央大权，破坏《临时约法》，孙中山南下护法。刘公十二月回到襄阳，召集旧部，组织护法军；同时，敦促襄陨镇守使黎天才宣告自主。北军吴佩孚率部进犯，黎部失败西退，刘公和豫军总司令王天纵以新聚之众，辗转川鄂之间，坚持护法。终因肺疾日益严重，经同志们力促，始赴沪就医于同济医院。经多方治疗无效，一九二〇年四月十二日于上海逝世，时年四十岁。其继室李淑卿，又名刘一，寄籍沔阳。李为共进会会员，曾在《楚风报》上鼓吹革命，积极支持刘公的革命活动。辛亥革命前夕被捕，胜利后出狱，任鄂军政府总监察处司印。后随刘公北伐。一九五一年病故。

一九二二年，黎元洪第二次任总统时，追赠刘公为陆军上将。一九二八年十月二十一日，由湖北省政府公葬于武昌卓刀泉寺后山之阴。

（襄阳县志办公室 李道兰）

彭、刘、杨（合传）

彭楚藩、刘复基、杨洪胜三志士，于辛亥武昌首义前，以头颅一掷，直接推动了辛亥革命爆发，其功永垂，其人不朽。

刘复基（1883—1911），生于湖南常德一农民家庭。早年读民末思想家论著，萌发反清民主革命思想。一九〇四年，肄业武陵县高等小学堂。曾先后两次参与黄兴宋教仁（一九〇四）马福益（一九〇六）的起义活动。事败，走上海，入同盟会。来往于湘沪间，秘密运销《民报》，宣传革命；又在上海办《就业旬报》。后应其兄星激任职的汉口《商务报》之招来鄂办报，结识詹大悲等，即投身湖北革命，参加群治学社。一九一〇年，立宪党人杨度过汉口，刘以杨度主张铁路国有，出卖民族权益，思对其有所惩罚；便招集湘鄂志士数百人于湖南会馆，又偕同志李抱良至英租界杨度寓处，佯请其蒞会；杨度察觉来意不善，不从，刘、李即挟之以行。英巡捕以“妨害治安”罪将刘拘押八小时；《商务报》连带停刊，群治学社也因而停顿。刘从此更认清了帝国主义庇护其奴才满清政府的丑恶面目。刘不顾体弱，毅然投军，入第四十一标第三营左队。刘入伍期间，群治学社改名为振武学社，辛亥年（1911）元旦又改称文学社，刘被推为评议部长。后文学社以革命形势发展迅速，入社同志急剧增加，乃设机关部于武昌小朝街八十五号同志张廷辅寓所二楼。刘离开营伍，住机关部专心进行革命活动。当时，共进会在湖北、武汉的活动，也侧重于新军士兵，故不免与文学社的活动发生磨擦。刘以彼此革命目的一致，力主会、社联合，并为此多方斡旋，消除了文学社对共进会的疑虑。辛亥八月，会、社举行联合会议，共同筹划起义大计；刘复基被推为军事筹备员，起义的很多具体工作均由他精心布署。